

毛泽东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运锋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调查研究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是毛泽东认识中国国情的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桥梁,也是毛泽东进行理论创造的基本途径。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告诉我们,为了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坚持调查研究,不断实现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

关键词:毛泽东;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9)02-0137-03

一、调查研究是毛泽东认识中国国情的根本方法

认清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1]“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种条件。”^[2]毛泽东认为,了解中国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的唯一办法就是调查研究。“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3]。

毛泽东不仅是调查研究的倡导者,更是调查研究工作的努力践行者,是注重并善于调查研究的楷模。在长期的调研活动中,他既坚持亲自深入到群众中,通过实地考察、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直接调查,又坚持通过历史资料、报纸刊物、侦察情况、下级汇报等方式进行间接调查,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相结合,使毛泽东对中国国情有了全面的了解。

大革命时期,为了驳斥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用了32天的时间,深入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五县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并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著作。通过对这些地区农民运动的直接考察,毛泽东解决了农民运动“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问题,从而为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为制定党对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调查研究成了毛泽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不仅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还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其中,寻

乌调查是毛泽东一生中作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也是我党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对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寻乌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实地调查。毛泽东通过实地参观、开调查会、同各行各业的人交谈等形式,详细了解了寻乌的情况。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了解了城市的商业状况,掌握了土地分配的各种情况,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从而为正确制定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确定土地分配中“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了解边区情况,另一方面又主要通过查阅报刊资料这种间接调查的方式了解国统区和敌占区的情况。1941年3月1日,毛泽东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发电报,请他们代订和购买国统区出版的报纸和书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三九、四〇年版),中外经济拔萃。”^[4]通过对这些书刊报纸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对全国尤其是国统区和敌占区的情况有了全面了解,从而为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调查研究。1956年,他用近两个月的时间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全面了解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状况,分析了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十大关系,为《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由于忽视了调查研究工作,党的决策出现了一些失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困难局面。他要求“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5]。1961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在当年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并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

收稿日期 2009-01-10

作者简介 胡运锋(1977—),男,河南许昌人,河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南、浙江进行调查,具体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各项政策问题。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主张、正确指导,来源于他对中国情况的正确了解,而他对中国情况的正确了解,又是来源于他对中国社会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正是通过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对中国国情有了全面的了解,从而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二、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桥梁

首先,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中发生的,这与欧洲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革命采取什么样的道路取得胜利,任何一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经过对中国社会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把握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反动势力异常强大和凶残且长期占据城市,而在农村的统治却相对薄弱这一基本国情,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构想。第一,毛泽东通过调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9]。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第二,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1930年10月,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兴国调查,对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后来说道:“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一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10]针对这样的状况,毛泽东指出,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赢得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第三,通过调查,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井冈山斗争时期,通过大量调查,毛泽东认识到,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下,根据地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样,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从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主要任务和主要斗争形式等方面,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和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其次,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马克思和列宁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是完成对小生产者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改造。他们主张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改造小生产者私有制,还设想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消灭资产阶级。十月革命后,由于俄国资产阶级采取敌对的态度,和平“赎买”在俄国并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制定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1953年春节刚过,毛泽东就南下出巡,沿途调查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情况。经过调查,毛泽东了解到,通过互助合作的开展,该县农村的生产力有

了很大发展,农民对互助合作表现出很大兴趣。据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在农业机械化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来提高农村生产力。同年3月,毛泽东又指派李维汉率领调查组赴上海、武汉、南京等工业大城市,调查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李维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明确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工业的过渡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毛泽东和党中央接受了这一建议。这样,毛泽东和党中央将马克思列宁过渡时期学说中关于改造小生产者私有制的理论,以及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设想,成功地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再次,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建设社会主义仍然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春,毛泽东对中央34个部委的调查,标志着这一探索的开始。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必须走自己的路,他把这一思想归纳为《论十大关系》。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分析和研究了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规定了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和方法,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路”。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其他领导人也对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可见,调查研究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桥梁。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始终如一地将其倡导的调查研究贯彻到底,在晚年背离了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严重挫折。

三、调查研究是毛泽东进行理论创造的基本途径

怎样进行理论创造呢?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进行理论创造的基本途径。他指出,作为无产阶级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11]。“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12]。可见,理论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理论是在当时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提供的只是一种方法和原则,而不可能是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创造出新的理论,而毛泽东

正是通过调查研究这一途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

进行理论创造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通过调查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和研究,从而提出正确的结论。首先,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获得大量的一手材料。如前所述,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在调查的方式上,他既坚持直接调查,又坚持间接调查;在调查的内容上,他既调查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又调查这个地方的阶级状况;在调查的范围上,他既调查一个地方的现在,也调查这个地方的过去;在调查的对象上,他既找工人、农民进行调查,也找非工农阶级和阶层人士调查。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毛泽东掌握了丰富的一手材料,从而为他进行理论创造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通过调查获得的感性材料进行深入的加工和研究,从而提出新的理论,实现理论上的创造。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和方法,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进行研究,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运用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进行研究,提出了把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改造和对资本家个人的改造相结合的理论,运用列宁关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状况和规律进行研究,提出了文化建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法。

这样,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这个基本途径,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四、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在通过调查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最大敌人。教条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认识和实践相割裂。教条主义者“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1]。他们不愿作艰苦的调查研究,对研究中国的今天和昨天一概无兴趣,结果是“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2]。同时,他们还抓住已有的结论不放,墨守成规,不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做出合乎实际的理论上的创造。由于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自居,动不动就拿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吓唬人,因此他们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3]“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

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4]。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教条主义。

第二,反对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的主要特征是轻视理论,夸大感性经验,把局部经验当做普遍真理。经验主义者拘守于自身的狭隘经验,不懂得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重要性,不懂得理论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作用。尽管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同样违背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同样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因此,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第三,坚持调查研究,不断实现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在调查研究中产生,同时也是在调查研究中得到发展和创新的。因为只有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才能不断把握新的变化的形势,才能总结新的社会实践的成果,从而推动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一项基本的工作方法,长期坚持下去,不断用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断把丰富的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传统,通过对变化了的国情的深入调查,总结我国在改革和建设中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实践无止境,调查研究无止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无止境。我们要继续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对不断变化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用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mail zwsf-002@163.com)